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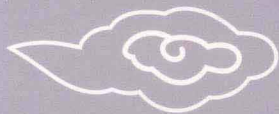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唐西州行政体制 考论

李方◎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

编·西北边疆卷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

李 方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 / 李方著. — 2版.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16-6810-7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地方政府—政治制度—
研究—吐鲁番地区—唐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112号



选题策划 丁一平 华 汉
责任编辑 华 汉 杨云鹏
封面设计 sddoffice.com
版式设计 王 绘 周 磊
责任校对 冀亚娇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330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6810-7 定 价 55.00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 www.hljep.com.cn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 东北网络台(www.dbw.cn)

如需订购图书, 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 0451-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539-2925628

如发现盗版图书, 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 0451-82533087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
——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

编委会成员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厉 声

副 主 编:丁一平 于逢春 李大龙

编委会成员:丁一平 马大正 于逢春 王子今

王希隆 厉 声 吕一燃 李大龙

李治亭 李金明 李国强 邢玉林

林荣贵 周伟洲 魏存成

序 言

边疆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域层面而言，是指国家毗连边界线、与内地（内陆、内海）相对而言的区域。一般而言，历史上中国的边疆是在秦统一中原、其重心部分形成之后确立的，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相应地，中国的边疆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并与国家和边疆的安危息息相关。

从近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过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国家边界沿革的考订、边疆民族发展的著述等，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在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一些朝廷的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近代国际法的领土主权原则，与蚕食我国领土的列强势力相对抗。黄遵宪、曾纪泽等都曾以“万国公法”为武器，在处置国家边界事务中与英、俄列强执理交涉。在边疆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将政治学、法学等与传统的史学、地理学等相互结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在国家与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又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国际法与政治学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之中，边政学的创立与研究、以现代学术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的全方位研

究，是这次高潮的突出成就；研究内容也从边疆领土主权、历史地理扩展到民族、语言、移民、中外交通等领域。与此同时，边疆考察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愈益受到重视。

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实现了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国史学研究向现代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变，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兴未艾。继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带来边疆学研究的三度兴起。此次研究高潮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盛于90年代，至今热度不减。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成立，这既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三度热潮的产物，也进而成为国家边疆研究的前沿引领者。

近30年来，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而且以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点，成为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对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已形成了从最初以中国近现代边界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近年，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已逐步形成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而为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模式。

边疆中心所实施的应用研究，是以当代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紧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当代我国边疆现状研究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国边疆区域的发展现实，促使中国边

疆现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学科定位：即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现状与历史不可分，现状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现状，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历史的和现状的综合性一体研究。通过对学科布局的适时调整，中国的边疆研究不断取得学科突破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进而尽快实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过渡。

短期内，我国在中国边疆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必须明确主旨，并应该有大的突破。在深化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投入的力度，不断探索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发展的规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为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和变迁构筑理论体系，是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近30年来，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为中国边疆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未来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边疆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要理论层面的支撑。在中国古代历史疆域理论、历代边疆治理理论，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的发展规律、古代边疆民族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以及在近现代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等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构建我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需要尽快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包括边疆学学科的概念、界定与范畴，学科性质和功能，学科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数所大学以开设边疆学博士点为契机，也在加紧边疆史地学科的构建；一些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围绕边疆研究先后出

现的相关学科命名有边疆政治学（边政学）、边疆史地学（边史学）、边防学、边疆安全学（边安学）等。但从学科层面看，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缺乏基本学科框架的规范系统论证。在诸如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及整体构建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研究；在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尽快拿出较为成熟的成果。同时，应注重学科理论建设与方法论的进一步开拓，在原有的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为主的基础上，扩展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突出边疆研究作为跨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特点与优势，不断加快学科建设步伐。

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出版是并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组建不久的边疆中心在成果出版方面寻找出路的时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伸出了合作之手。一晃至今，双方精诚合作了20多年。先是以《边疆史地丛书》的形式，自1991年3月开始出版，截至2011年，先后有70余种边疆研究著（译）作面世。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持续有力地推动着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不断发展。如果说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方面成了学术前沿的引领者，那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以边疆研究成果的出版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出版社。

在当前我国边疆研究氛围持续高涨的形势下，经边疆中心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努力，将以更为严格的科学态度、更为严谨的学风文风，共同出版水平更高的边疆研究著作。双方遂决定以《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的形式，由边疆中心组稿审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由《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近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校及解题》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两部分组成。前者共选出近50种近代以来

面世的我国边疆研究学术著述，在实施点校的基础上，做出导读性与研究性的解题，予以重新出版；后者选择近 50 种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边疆研究的老一代知名学者、中年有为学者、年轻后起学者的著述，汇集出版。可以说，这些著作基本代表了目前我国边疆学研究的水平。

同时，对 1949 年后有较大影响的边疆研究著述又进行了修订出版，特别是将新近的研究成果充实其中，使这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内容更加翔实、完整，更具学术价值。

今天，中国边疆研究已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显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尚属开创之举，一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在目前《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二编近 100 部著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努力开拓进取，组织更多边疆研究的优秀成果，继续出版三编、四编……为我国边疆研究的持续兴盛，为繁荣边疆的历史文化，为今天我国边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库》系国家出版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办大手笔支持我国的出版事业，本《文库》是无法面世的。在此，请允许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主编谨识

序

李方的《唐前期西州地方行政体制考论》即将问世，可喜可贺。这部《考论》是她的博士论文。但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李方致力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光景，单是同西州官府官吏、地方行政相关的论文，就已经发表近20篇之多。嗣后去职问学，拜师读博，不妨看作是她西州课题研究的继续和深化。待得二十余万字的《考论》一朝杀青，她这个十多年“念兹在兹”的大课题，不说功德圆满，也算是得集大成了。在李方的学术生涯中，《考论》是一座里程碑。在她答辩以前，忝为《考论》“评阅人”的我，有幸先期拜读，不禁惊喜于它沉甸甸的学术分量，写下了这样的“评议”（其中的修改意见从略）：

作者对吐鲁番文书所含西州行政的学术信息提取相当彻底，新疆、旅顺、上海、日本、英国等几处度藏尽在掌握。将相关考察分设为机构、官吏、职掌、运作等四个视角，学术视野相当开阔。分层次的丰富解读，细致而深入。对史籍有关地方行政的记载精读深思。散见于唐人笔记、小说、碑志中的资料，钩稽甚难，作者辛勤搜出，丰富了释证。掌握中外学者的成果相当充分，有借鉴，有评鹭，有补充，有纠正。章、节、小目，条理清晰；举证繁富，立论谨严；表述准确、平实。置局部于全局，注意把握前期西州行政体制的地域、民族特性及其作为唐朝正州之

一的共性。

全文结构宏大，多层次的考释论证每含前人未发，富自见之，创新性强，学术价值较高。虽只考论西州，但对增进唐前期地方行政体制的认识，具有普遍性启示。

这是一部优秀的论著，也可以说是近年吐鲁番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回头来看，李方当初选定西州地方行政为研究方向，颇有眼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自秦行郡县起，发展至唐而臻于成熟。李唐王朝立祚久长，疆域辽阔，政情又复杂多样。它的内外朝一整套行政体制，作为现实的国家机器之主体，举凡衙署设置及运作、官员构成及职掌等，无论因革置废，大抵须揆时度势。故有唐一代的行政体制，异时异地颇见变易。就外朝行政体制而言，中原州县与西北、西南诸边陲州县（不包括羁縻州），其各自所处经济状况、军政情势、民族关系等，已然千差万别；从初唐盛唐经中唐至晚唐，时移势易，诸般情境又会有许多变化。这不同时空的种种变数，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当时当地行政体制的建构，尤其会影响它的运作。史籍如《旧唐书·职官三》“州县官员”、《新唐书·百官四下》“外官”、《大唐六典》“三府·都护·都督·州·县官吏”以及《通典·职官典》“州郡”等，载唐朝地方各级军政体制颇详。作为李唐一统政体中的外朝体制，如上政书确乎蔚然展示了大唐地方军政体系绵密而宏大的架构。然而，政书所载毕竟属于皇颁“通制”，从中既看不到地方军政的动态运作，也看不到它在长期运作中层出不穷的“权宜”和变通。而这些“权宜”和变通，往往是更本质的东西，更能揭示特定时空之下地方政体的特性，披露重要的历史真相。今得敦煌吐鲁番文书，犹如一方方斑斓的历史化石，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无量信息，“全息存储”式地凝聚、蕴结、定格在它的断纸残文中。这批琳琅遗珍，补苴传世文献之不足，

不断召唤莘莘学子投身学术新潮流，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开一新生面。李方博士正是预流其中的又一位执着的行者。

同行学者知道，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读不易。文书不同于传世典籍。传世典籍的学术内涵同它的文本名称大抵一致，如行政制度必见之于政书；出土文书的文本性质却五花八门，它的学术内涵同文本名称未必一致，如有关土地制或赋役制的重要信息，可能隐于户籍残卷或社邑名簿。古代写卷的外在形式同它蕴含的学术信息没有必然联系。学者们要想从这些“历史化石”的深处，把自己所需要的学术信息激活唤醒、萃取出来，只能靠自身学术素养的长期积累，靠“板凳须坐十年冷”（范文澜语）的执着，舍此别无捷径。人们常用“披沙拣金”“凿璞探玉”来形容一件事艰难费功。从古文书中提取学术信息其实更难。金玉虽然深藏于沙石，但它们优良的品质和美好的外观毕竟迥别于粗糙的沙石。隐藏在古文书中的学术信息却往往了无具象，欲捕捉它，只能靠丰厚学养浸润而成的一颗“心”，从字里行间去体悟。

面对如山的“历史化石”，为孕得一颗烛照幽微的“慧心”，李方当初义无反顾决然而行，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一条坎坷长路，一走就是20年！与一般学者自定专业不同，李方从事敦煌吐鲁番学是被“逼上梁山”的。她在大学侧重于世界史。1982年自武汉大学毕业，分配来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先是安排她整理《隋唐墓志汇编》，后转入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事业在迫使她“改行”。她勇敢地接受挑战，没有犹豫。一切都几乎从零开始。她扑下心来，从一方方墓志、一片片文书的录文做起。赖有古文献室良好的学术氛围，常得唐长孺、周绍良等名师教诲，更兼贤夫婿王素日夕襄助。好学好问的天性，“转益多师”的自觉，被她发挥到了极致。那时在许多学者面前，每每会看到李方切磋求教的身影。可她也真难啊，尤其是做了母亲以后。那些年，既要抚育幼儿，又要做学问，衣带渐宽，形容憔悴，是身

体的困顿；殿堂初入，众里寻她，芳踪莫睹，怅惘何似，是心灵的折磨。难怪她每忆当年，总会说那些日子满含苦涩，里面“有我的血和汗还有泪”。

一位欧洲哲人曾把科学的入口比喻为“地狱之门”，意思是说凡有志科学事业者，他的身心须准备承受炼狱般的折磨与考验。中国的孟夫子早年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含意差似。二十年暑往寒来，李方博士终于胜利穿越了心灵的炼狱！如今谈起《考论》，她竟作如是说：“本书给予我极大的精神享受。撰写过程中，每天清晨一醒来，想到今天又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件重要而有价值的工作，不由得从心底里感到快乐和欢欣。”我想，这种精神享受，该是狂风暴雨过后，坐望云霄天开的那份宁静；这种快乐，该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后，抱望宁馨小儿的那份甜蜜。困顿苦涩升华为精神享受，血汗眼泪幻化作快乐欢欣。学术心境一百八十度大逆转，倒是又应了辛弃疾的那句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或者套用欧洲哲人的另一比喻来说，大约李方的学术心境，已然从“必然王国”开始迈向“自由王国”了。

于京东云鹤斋

前 言

一、唐灭高昌建西州的意义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麹氏王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建立西州。这在当时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前者不仅表明唐朝在政治上翦灭了一个独立王国，在军事上进行了一场大的战争，而且意味着唐朝从此进入西域，开始了对西域的统治和经营。可以说，唐朝前期的政治昌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外交频繁、疆域辽阔，均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而后者不仅因为当时朝廷曾为此爆发过两次激烈的争论，且后来西域一旦有事，朝廷君臣都为此议论不止。然则当时唐太宗为什么一定要灭高昌呢？

（一）高昌与唐的恩怨

高昌地处天山南麓，西域东部。它虽然曾受匈奴、柔然、突厥、西突厥等少数民族的控制，但由于其基本上以汉人为主，故历史上一直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西汉初元元年（前48年），汉王朝即在此设戊己校尉，镇守屯田，并构筑了高昌壁。历经东汉、曹魏、西晋，高昌也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领地。稍后建立的高昌郡，又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中原和河西政权。460年，汉族流亡者始建独立的高昌王国。500年，

麹氏高昌建立。麹氏高昌王国的政治制度及文化、风俗都源于中原，并非常重视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曾屡次遣使北魏、梁和北周。隋大业五年（609年）和七年（611年），高昌国王麹伯雅两次亲赴中原觐见炀帝，炀帝将两个宗女宇文氏分别嫁与伯雅及其子文泰为妻。唐武德二年（619年），伯雅遣使向唐朝贡。六年（623年），伯雅死，子文泰立。文泰登基之始，同样重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特遣使向唐告丧。高祖命使者前往吊唁。不久，文泰还遣使献拂林狗。太宗继位，文泰又献玄狐裘。太宗回赐文泰妻宇文氏华钿一具，宇文氏复贡玉盘。凡西域有所动静，文泰皆秘密报告太宗以示效忠。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文泰还亲自入朝，其妻宇文氏并请入宗籍。太宗赐宇文氏李姓，封常乐公主，赏赐甚厚。

但是，从贞观六年（632年）起，麹文泰开始转变了对唐朝的态度。这一年，高昌邻国焉耆王龙突骑支遣使入朝，请求恢复由焉耆通往内地的大磧道。太宗许之。文泰闻之大怒，遣兵袭击焉耆。高昌大臣担心因此得罪唐朝，纷纷劝阻，其中以佐命功臣左卫大将军都绾曹郎中张雄规谏尤力。但文泰不听，张雄因之积忧成疾，不久即卒。这一时期，文泰不敢公然与唐对抗，还想与唐朝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如贞观八年（634年），又遣使朝贡。但此后数年，文泰胆气渐壮，不但不再朝贡，还公然拘留西域诸国入唐朝贡的使者。隋末战乱，中国人多投于突厥，或辗转投奔高昌。太宗令文泰护送回国。文泰不但抗命不遣，还将这些人隐蔽起来，罚做苦工。文泰在国中置官署位，一准唐朝；又筑城挖堑，准备战事。高昌与唐的关系已笼罩着一层阴影。

贞观十二年（638年）以后，高昌与唐的关系更加恶化。这一年，高昌与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再攻焉耆，拔其五城，掠男女1500人，焚其庐而去。十三年（639年），又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联兵攻唐之伊州。太宗下诏痛斥文泰，并征高昌大臣阿史

那矩入朝议事。文泰拒不从命，仅遣长史鞠雍进京谢罪。文泰对唐朝使者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资治通鉴》卷195）又遣使到漠北对薛延陀说：“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旧唐书》卷198《高昌传》）太宗希望文泰悔过，下玺书征之入朝，以喻祸福。文泰却称疾不至。至是，高昌与唐彻底决裂。

高昌与唐恩尽怨来，主要原因是感到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而这种威胁来自前面提到的伊州和焉耆。以前，高昌东邻伊吾，西邻焉耆。贞观四年（630年），唐将伊吾置为西伊州；六年，改为伊州，正式纳入国家版图。伊吾本为高昌与唐之间的屏障，一旦改置为唐属伊州，高昌便直接与唐为邻，使其感到自身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胁。同时，唐朝支持焉耆通大磧路，又触犯了高昌的经济利益。唐初，高昌是西域通向内地的主要通道，在中西贸易中颇为得利。大磧路的开通，意味着西域诸国可以避开高昌，直通内地。这样，将直接影响高昌的经济利益。高昌要维护自身的安全，控制中西贸易的通道，就必须打击伊州和焉耆，与唐对抗。

鞠文泰敢于与唐对抗，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鞠文泰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互相勾结，沆瀣一气。60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西突厥统治西域。唐初，西突厥注重获取唐朝的支持，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利娑咄陆可汗、啞利失可汗都遣使入朝，分别得到了唐朝的承认或册命。贞观十二年（638年），西突厥内乱，分裂成为两大势力，啞利失可汗继续与唐友好，而新立的乙毗咄陆可汗则与唐为敌。因乙毗咄陆可汗的辖区毗邻高昌，鞠文泰便以重金厚饷乙毗咄陆，约定有急相助，共为表里。可汗派宗室阿史那矩入居高昌，监国兼政；又派部将欲谷设及叶护等屯驻天山北麓的可汗浮图域（今吐鲁番西北吉木萨尔）。鞠氏高昌军队不多，有了乙毗咄陆可汗的

支持，便有恃无恐，敢于同唐朝抗衡了。

第二，麴文泰过高地估计了高昌的地理条件。从内地到高昌遥远险阻，其中有莫贺延大沙碛，人称“大患鬼魅碛”。据说此地“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文泰曾两次通过沙碛入朝中原，深知沙碛的险恶。张雄妻麴氏墓志云：“阻漠凭沙，国有偷安之望。”说明文泰早就有凭借沙碛，偷安一隅的想法。贞观十三、四年，他听说唐朝已决定发兵，对国人说：“唐国去此七千里，沙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又说：即使唐军过得了沙碛，也必定疲惫劳顿，不堪一击。他以为凭借地理条件，就可以抵挡唐军的进攻了。

第三，麴文泰过低地估计了唐朝的实力。文泰曾两次去中原。第一次是在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十二月，他随其父伯雅觐见炀帝，跟随炀帝征高丽，游代、汾、晋等地，在内地待了一年有余，次年十二月底始返高昌。隋朝的繁荣昌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次是在唐贞观四年（630年），其时唐朝建国不久，隋末战乱给中原造成的破坏还未恢复。他发现唐朝“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朝之比”（《旧唐书》卷198《高昌传》），遂有轻唐之心。他认为：唐军若来进攻高昌，发兵多则粮运不给。即使屯兵城下，20日食必尽也自然溃散。高昌纵兵追击，可一举获胜。唐军若发兵3万以下，高昌军队则可应付自如。他甚至预言：高昌可以逸待劳，坐观唐军之弊。

然而，事实又将是如何呢？

（二）唐灭高昌的经过

麴文泰的所作所为，大大地激怒了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太宗命唐军讨伐高昌。太宗的决定，在朝廷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